

台灣經濟學界的危機——評胡勝正教授之「經濟思想的引進」

黃春興（清華大學 經濟學系）

2013-10-26 於台灣大學「施建生教授學術研討會」

感謝主辦單位的邀約。

李顯峰教授指定給我的任務是「評論人」。我以爲是評論施建生教授的經濟思想，就上網購買施教授的《現代經濟思潮》和三本偉大經濟學家的傳記。1975年，我計劃投考台大經研所，開始閱讀的第一本書就是施教授的《經濟學原理》。施教授應該算是我在經濟學的啓蒙老師，雖然，直到今天才見到本尊。我那時是每週從新竹搭公路局客運到台大經濟系來聽課，主要是孫震教授的「總體經濟學」和王作榮教授的「經濟學原理」。有一天，看到學生擠在一間教室聽一位洋人的演講，那是我第一次聽到「海耶克」這個名字。沒想到，奧地利學派經濟理論會成爲我的專業研究領域。

李顯峰教授邀請我的主要理由是施教授也專精於奧地利學派。可是，在讀完施教授的這些書之後，我感覺到施教授比較偏愛的是舊制度學派。我的理由有二。第一，《現代經濟思潮》的編排是以第二章的「范伯倫」(T. Veblen) 開頭，而以第十五章的「高培斯」(J. K. Galbraith) 結束，這兩位都是舊制度學派的知名學者。第二，施教授在該書最後一章「經濟學之改進的方向」中提出兩點結論，也都是舊制度學派的觀點。我抄錄於下：

- (一) 「與凱因斯的總合經濟學一樣，系統分析或者個別廠商的經濟決策都是靜態的。它對於技術變動、以及其對於工業制度之結構與功能的影響則不加討論。」(541 頁)
- (二) 「將來的發展如何此時自不敢斷，但他們(演化的方法)所提出的對正統經濟學的批評，以及其應加改進的方向，是很值得我們深思的。」(543 頁)

雖然我感覺施教授偏愛舊制度學派，但他也不是不無批評。譬如他對范伯倫便批評道：「范伯倫對於經濟之將來情況的分析亦有些缺陷，他沒有注意到其間所須考慮的經濟計算問題。」(82 頁)「經濟計算問題」是奧地利學派反對計劃經濟的重要論述，經濟學者理解的並不多。施教授在第一章「經濟思想演變的輪廓」

是這樣結尾的：「這樣，早在 1920 年代由米塞斯、海耶克諸氏所提出社會主義因忽視經濟計劃問題必不可行的論據，也就真的說對了。」(56 頁) 讀到此，我不得不對施教授表示由衷的佩服，也致上我最深的敬意。

收到研討會的議程表，我才知道要評論的是胡勝正教授的演講。胡教授是我的老師輩的學長，對於台灣經濟學界的認識遠較我清楚。我們都是從主流的新古典學派的學校畢業，而胡教授在這方面的功力已經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。幸運地，我從新古典學派轉到了奧地利學派已有二十多年了，可以有不同的角度來看相同的問題。

胡教授的題目是：「經濟思想的引進」。就我個人的認知，台灣的經濟學界長期以來並沒有發展出自己的經濟思潮，因此，經濟思潮的「引進」和「演變」或「發展」也就是同一件事。

胡教授將台灣的經濟思潮以 1960 年和 1980 年為界分成三個時期。1960 年之前是以研究經濟思想為主的古典期，1960 年到 1980 年之間是以發展個體經濟學與總體經濟學為主的「舊幹新知相互砥礪」期，而 1980 年之後為引進新方法論與新興領域的「百花齊放」期。很幸運地，我在百花齊放的 1978 年進入台大經研所就讀，胡教授文中提到蔣碩傑、費景漢、于宗先、張漢裕、陳昭楠等教授都是當時教我的老師，另外還有胡教授沒提到的李登輝、萬又宣、劉克智、趙乃偉等教授也都是我的老師。

對胡教授這三時期的分法，我選擇不同的描述，分別稱為「經濟體制及其思想」、「經濟發展及經濟政策」、「經濟活動之數量分析」等三時期。改變稱謂後，這三時期會有些重疊，但整個時期的趨勢還是清晰的。這稱謂的轉變或許可以較明顯地表現出台灣經濟學界之視野的改變。胡教授認為這些轉變的主因是「階段任務完成」。轉變稱謂之後，我的看法也跟著不同。

首先，在專注於研究「經濟體制及其思想」時期，借用海耶克的話說，「只懂經濟學的經濟學家絕對不會是一位好的經濟學家」。張漢裕老師也有一句讓我時常用以反省自己的話，他說：「經濟學家不能沒有 common sense(廣義的常識)」。這是那個時期的經濟學家的視野。

到了研究「經濟發展與經濟政策」的第二時期，經濟學走向應用，經濟學家模仿理工科學的發展，神聖化「其他條件不變」的分析假設，逐漸朝向專業分工

和專精研究方向發展。如胡教授所說，這時期大批留美學生學成返國，大量採用數學模型進行經濟分析。亞當史密斯在《國富論》中提到，分工和專業化固然可以提高產出，但其嚴重缺陷是會讓從業者喪失「智、仁、勇」的美德。除了消費與生產，人類的生命還需要美德。在經濟學界，這美德就是 *common sense*。不過，這問題在第二時期還不嚴重，畢竟「舊幹新知相互砥礪」。

在進入第三時期，經濟學者專精的對象已不再限於一個經濟學的次領域，而是可以不碰觸經濟思想的數學，或統計，或計量，或實驗。經濟政策是政府的主要政策，經濟學者一旦失去了美德，其政策建議就隱藏著撕裂社會的危險。

經濟學者若失去美德，還存在另一個問題，就是只看得見分析工具的精緻，卻無法理解學派爭議的意義。胡教授在文中也提到台灣在 1980 年代的蔣碩傑與王作榮的論戰。然而，從施教授於 1955 年出版《經濟學原理》至今，近六十年來，台灣也只出現過這麼一次的經濟論戰。這不僅是遺憾，還是台灣經濟學的發展危機。競爭帶來進步，這是經濟學理論的精髓。思想市場的競爭是表現學派的爭議。如果我們反觀專制政權下的中國大陸，自改革開放以來，他們卻也累積了近十次的經濟論戰：農地承包經營、價格雙軌制、匯率機制改革、國企股份制改革、預算軟約束、財政分權、放權讓利，國進民退等，而當前正酣的論戰是經濟發展的「中國模式」。胡教授對蔣王論戰的評論是：「對學說的引進，貢獻良多。」由此，即可以理解我談的台灣經濟學界的危機。然而，真正的危機，比這兒所談得還大得多。因限於時間，只能談到這裡。

謝謝。